

格局、制度與命運共同體： 在「聚焦灣區 共建帶路」專題午餐會上的發言

閻小駿

2019年4月15日

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

我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聚焦灣區，共建帶路」專題午餐會。剛才，從各位的發言中，學到很多，很受教育，非常感謝。

今天午餐會的主題，「大灣區人才一體化—共生、互通、多贏」是個很好的命題；我想，「共生、互通、多贏」六個字也準確揭示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願景所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國改革開放再出發這一藍圖的重要篇章。如何落實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特別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我想用三個詞來分享一點想法。

第一個詞是「格局」。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珠三角地區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GDP總量超過10萬億人民幣，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我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舉措。2012年以來，我國陸續形成了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部有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西北、西南、東北也都形成了各自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的規劃。我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特別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首先需要站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大格局上、站在全國協同發展、全面開放的大格局上進行思考

和謀劃，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所慮者遠、方能所成者大。正如習近平主席講得那樣，要「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在這裡，站位是不是高、格局是不是大，對大灣區建設的成敗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詞是「制度」。眾所周知，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灣區有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這幾個灣區的規劃和建設都是在同一種社會制度、同一種體制的框架內進行。與它們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司法管轄區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制度方面的差異是比較大的。粵港澳三地在經濟自由度、市場開放度、營商便利度及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小的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其他灣區所沒有的制度和體制機制難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關鍵是要通過制度和體制創新，促進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活力和競爭力。因此我想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要素。

第三個詞是「命運共同體」。正如剛才講到，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在經濟、金融、社會、法治等制度層面和發展程度上都存在很大差異的一個特殊區域。在這樣一個區域開展互聯互通、經濟融合、人才一體化的嘗試，讓理念、制度、生活方式等都存在較大差異的不同地域和居民都能和諧相處、安居樂業、共謀發展，進入未來更新、更好、更高的發展階段，這也是在二十一世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的探索。

探索人類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諧共存，尋找實現不同文明、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們「共生、互通、多贏」的道路，也正是當年我國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這個重要構想的初心所在，是新時代「一國兩制」重要構想在香港、澳門的實踐行穩致遠和「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最終得以實現的力量源泉和信心所在。

各位嘉賓，

「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這是唐朝宰相魏扶一首詩裡的兩句。為了追尋新中國七十年對港政策的初心，在國務院港澳辦、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力協助下，從 2018 年春天開始，我和我的同事用一年多的時間走訪了十位新中國對港工作、特別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一國兩制」重要構想形成和香港回歸祖國全過程的重要親歷者，包括周南、姜恩柱、陳佐洱、王鳳超、徐澤等老領導，也包括梁振英、譚耀宗、譚惠珠、費斐等當年參與這一過程的香港知名人士，還包括了 1949 年就來港從事香港工作、目前已屆九十高齡的對港工作老前輩張祥霖老先生。最後形成了 25 萬字的訪談錄，繁體中文版很快將由中華書局（香港）出版，簡體中文版稍後也將在北京出版。

在這些訪談中，令我們感動的是，雖然很多老領導、老前輩已屆耄耋之年，作為「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親歷者、踐行者和見證人，他們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國家主權、治權的完整統一，仍是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他們所殷切期望的是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依託，我們能最終尋找到一條成功的道路，既把社會主義的祖國內地建設好、也把資本主義的香港建設好，希望我們能尋找到一條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們和諧共處、安居樂業、共謀幸福生活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嶄新道路。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想，這裡體現的正是新中國七十年對港政策一以貫之的傳承和延續，是幾代港澳工作者初心不改、一代一代接著幹的精神力量。我也相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潮推動和引領下，老一輩的期許一定能夠實現。

謝謝各位。